



未来国际管理框架项目： 美国、俄罗斯、中国及印度的贡献

纽约卡内基基金会
金融服务志愿者公司 (FSVC)

该项目第二次研讨会上报告起草人所作报告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2013年6月8日-10日

由金融服务志愿者公司 (FSVC) 及纽约卡内基基金会承办的未来国际管理框架项目：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贡献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研讨会于 2013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参与者很多都曾出席 2012 年新德里第一次研讨会。这样增进了讨论的连贯性，也使得深层次的对话成为可能。同时，本项目来了几位新成员，这些人被认为都是未来的思想领袖和决策者，为讨论增加了新的视角。

议题

北京研讨会，承袭该项目重心，处理四个全球大国—美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往往是跨国和全球性的，因此此次讨论也将解决一系列紧迫的国际问题。其中部分内容具有现实意义，这也使得主要国家间的合作更为关键。

2012 年 12 月新德里研讨会上出现的多数主要议题在 6 个月后的北京研讨会上再次被提出。研讨组没有重温所有议题，而是着重讨论其中部分内容，也旨在提出新的观点和可能的政策建议。

北京研讨会上的一些主要议题如下：

¹ 本报告为该研讨会报告起草人丹尼斯·马斯洛夫 (Denis Maslov) 起草。该项目首席研究员包括：弗吉尼亚大学弗兰克·巴腾领导和公共关系学院院长哈里·哈丁 (Harry Harding)，FSV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安德鲁·斯平德勒 (J. Andrew Spindler)，以及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约翰·D·斯坦布鲁纳 (John D. Steinbruner)。FSVC 为本研讨会所作的人员支持由乍得·吉尔伯恩 (Chad Kilbourne)、安德烈·佩劳德 (Andrea Perraud) 和爱德华·希恩 (Edward Sia) 负责。

FSVC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帮助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建立健全的银行和金融体系。有关 FSVC 的详细信息，请登录网址 www.fsvc.org 查看。

(1) 当今世界的特点是，“知道”和“行动”都很困难。知道问题的本质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都很困难，因为愈加复杂的系统下所表露的问题，了解其全部方面已经超出了个人甚至团体的能力。在这个系统下进行决策，出现非预期结果的风险愈来愈大。

行动一比如改变现行知识和政策观点—由于反对意见、资源有限以及能力有限以及其他的执行问题而变得极具挑战性。许多人类知识固有的不确定性也显然会被反对派有效的利用，例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问题。

(2) 个别国家和社会以及全世界所面临的挑战都很严峻，而且愈加复杂。研讨会的基调也出于对于许多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和困境的认识。然而也应认识到，尽管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而且棘手难除，但是它们也是人类的产物，因此可以通过发挥人类的智慧和能力解决。也就是说，许多方面都亟待采取行动。

(3) 现有政府机构及其领导层都不足以应对当今日益复杂的问题。尽管每个国家解决领导真空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加强公共管理和公共部门决策显然是共同需要。

(4) 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参与者数目不断增长。这种趋势早已存在，且仍在继续。故应当加以考虑，尤其是在讨论诸如网络安全、核技术安全等跨国威胁或处理全球流行病的时候。无论是创建新的跨国组织和权力中心还是加强现行组织的功能，许多问题都需要跨国的解决方案。从负面角度看，诸如失败国家、国际犯罪网络、海盗及其他等团体在应对国际挑战时可能会起到不利作用。

(5) 在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和国外政策愈加融合。因此信息、宣传、信息技术对于国内外的受众来说意义重大。

(6) 世界范围内包括所有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对于政府和政治机构的明显信任危机。尽管态势并未演变成为更广泛的合法性危机，但是民众对于政府、政治及政要的不信任不断增加，将使得寻找问题解决方案愈加困难。这并不仅仅适用于美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也适用于欧盟以及在北京研讨会举行期间或此后发生抗议游行的国家，如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等等。

(7) 为了有效应对挑战，对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深入的结构变化是很有必要的。然而，此种结构变化难以执行。故而参与者往往表示，对局势进行有效改变会带来危机。

(8) 为促进经济持久增长，收入更加平等、最低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国家内部。

(9) 预计即将到来的危机和业已出现的一系列危机成为整个会议期间汹涌的暗流。

国家讨论

自上次研讨会以来，在场国家均未对项目中有特定利益关系的问题采取重大措施。来自四个国家的所有参与者，可能中国参与者部分外，均对本国政府和经济的现状感到悲观。

事实上，给所有国家的处方都相似：需要更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然而，为了获得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提升，政治行动也是需要的，尽管所有制度内的政治进程都被打破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正常发展。所有在场国家的政策制定都出现了重大限制，而且常常没有效力。

美国

在美国，当今的主要问题从来不会达成共识，无论是政治派别间还是社会各阶层。2012年年底，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再次当选，并拥有更大的权柄。然而到目前为止，他的第二任任期内仍未出现重大政策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控制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在财政政策（可能包括减少国家债务和可能有关税收和福利系统的变化）方面，两党间所谓的“大谈判”出现了建设性的进展。双方可能在该谈判中达成共识，部分原因是为了结束现已生效的支出减赤。然而在2013年4月，该积极态势却因美国参议院否决枪支管制立法而终止。

从广义上讲，当两党有着改变下个选举周期一个或者两个国会议院多数席位的实际机会时，促成两党妥协的诱因是比较小的。（1994年以前，这种情形不会存在，因为在二战后大多数时间里民主党控制着国会两院。）这就给予国会领导人一种不好的影响，致使其会破坏对立党的议程，无论该议程来自白宫还是来自国会内部，期望着对手的议程失误会得以让自己所在的正当在下一选举中获益。当选区划分不公正而使得一党国会多数席位地位保持“安全”时，促使两党妥协的诱因会被进一步削弱。因此，美国正经历着规模庞大的政策和政治僵局。

美国经济有了缓慢而又短暂的复苏，特点是仅有就业方面微弱的增长。尽管如此，在主要工业化经济体中，美国的经济迄今一直是最好的，而且跟欧盟经济低迷记录相比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积极发展的体现之一就是财政赤字有了改善，美国财政赤字一直以超越预期的速度削减着。美国的能源革命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且也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显著影响。然而，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正在增加。

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的一系列丑闻，加之美国各政府安全机构对于民众私人生活以及通讯可能的入侵，进一步削弱了美国政府本已受损的公信力。然而，整个国

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无论是应对全球变暖、解决严峻的财政危机、继续整顿其金融监管还是升级其老化的基础设施—都需要政府行动，也因而迫使华盛顿特区的决策者们达成妥协。

欧盟/欧元区

欧盟仍在为欧元区危机及其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头疼不已。尽管目前这场危机的强度已经减少，许多欧盟成员国及其国民所受伤痛却是深远的。而且，几乎没有人认为这场危机已经过去。引发危机的众多结构问题，例如过高的公共债务和难以为继的公共福利，仍然残留而且难以很快解决。解决危机的所有办法都牵扯到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和主权概念，使得欧元区危机除了经济危机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危机。

欧元区危机及其对欧盟的影响中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是，许多亟待布鲁塞尔和各国政府领导人关注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且变得越发紧迫。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包括：

1. 人口迁移，以及内部移民政策管理。
2. 欧盟危机加剧的分裂主义倾向，尤其是在西班牙、比利时和英国，确实可能导致许多欧盟国家脱离欧盟。
3. 在欧盟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缺乏协调一致的立场。
4. 贸易问题，例如，欧盟与美国创建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对于该项目欧盟表示欢迎但不热心。
5. 欧盟与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举足轻重的中东/北非区的关系，该区域位于欧洲大门口，经历了阿拉伯之春运动，且区域内的国家至今仍然动乱不已。

以上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且常常为决策者和民众所重视。然而，相对于处理这些问题，政府们往往为相互更迭的欧元区危机和伴随而来的欧洲政治经济变化忙的筋疲力尽。

欧盟正在慢慢发生的一个政治过程是“模块化”，即欧洲国家参与“欧洲”事务的层次不再单一。不同的参与层次将会产生不同的权利、福利和义务。“欧洲”这一概念目前是灵活多变的，“欧洲”由大量不同的欧洲政权、机构、组织和社团构成。欧洲协议的“模块化”可能会在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内部国家处理危机余波时提供参考。

中国

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了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并且对于如何应对已有思路。然而，很多仍然有待观察。据北京研讨会一位资深参与者说，习近平主席和他

的同事认为市场是中国经济的弱项。然而，如何使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尚需要时间来定义和实现。

中国已经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新一届政府意欲带来更多合理的事物，但同时也强加了更多管制。比如，政府希望司法系统有更全面的透明度和秩序。同时，却对国家宣传机器管制更严格。

带有积极因素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便是对《土地法》的修订，包括征用制度改革。农村农业用地所有权对于平衡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至关重要。当前，由于陈旧的法规和补偿机制，占有或使用农业用地的人们无法从土地快速升值中获利。

消极的一面看，中国经济可能会进入一段不稳定时期。经济成本在上升，信贷在蓬勃发展。国家不同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解决经济中的大量的泡沫，只能通过危机击破泡沫实现。结构改革迫在眉睫，可能只能通过危机来实现。

新一届领导班子已将当前经济形势定义为“不平衡而且不可持续的”，含蓄地批评前一届。中国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创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已经开始消除政府批文层级，这也可能加强其反腐的力度。然而应当注意，中国的中央政府非常小—大约 50000 人构成了中央权力机关—因而其对整体经济的监督和管理能力有限。不过，地方政府的巨大创新能力却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社会各界不断呼吁政府重新平衡国家重心。北京以及其他主要城市中心的空气污染是安全范围的许多倍。中国的城市居民，尤其是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可能会乐意牺牲一两个 GDP 百分点来换取清洁的空气或者更好的食物及水源安全管理。

中美关系

北京研讨会举行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正与习近平主席在加利福尼亚州会晤。据中方与会者称，中国意欲建立新形态的双边关系，该双边关系将是建立在下面 3 个原则上的“大国关系”：

- (1) 不否认对方的意识形态；
- (2) 不对对方构成实际威胁；
- (3) 全球管理方面进行合作；

印度

在 2014 年下一届选举，总理曼莫汉·辛格离职前，印度不太可能会见到多少积极因素。同时，经济指标正在恶化，颁布的政策通常都毫无效力。

经济自动增长的日子已经不再。然而，印度并未远离极其昂贵的社会福利计划，其经济管理不善和腐败仍然是大问题，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更多问题。该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大有问题。对于社会方面，食品价格通胀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饮食结构的巨变正在发生。总体而言，印度国内的情况欠佳。

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政治阶级的腐败和责任缺失感到不满。针对腐败和对妇女的暴力侵害表明印度的民间社会面临新的动荡，也表明民众要求变革的压力愈发增大。

印度的当务之急是为政府和经济各阶层建立独立监管机构。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RBI）通常享有高度独立性。然而，政府正努力将之与财务部捆绑，以削弱其独立性。该行动方向有误。国家需要更多独立监管部门和更完善的经济管理。

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机构是印度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两个积极因素，这些因素在选举和印度下一阶段的发展中会展现其益处。

俄罗斯

2013年，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治制度变得愈发僵化和保守。许多俄罗斯与会者表达了他们对国家方向的担忧和悲观。俄罗斯现在的方向是，增加俄罗斯政府在国民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经济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政府的影响力（该影响力已经非常巨大）正在增长。政府目前正在通过国有企业，渗透到新的经济领域，例如电信行业。2013年初，俄罗斯政府出台的新型税务制度，使得数十万家小企业倒闭。尽管俄罗斯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比如其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可能有些积极效果，但是这些积极效果还是被国内环境的消极影响所抵消。

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国家而且特别是总统办公厅正在消除任何他们视为可能是反对政权的政治或社会行为。国家出台了众多限制性的新法律法规。举几个例子，他们迫使接受国外资本的民间社会团体和研究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该术语有着间谍活动的内涵；大力歧视特殊公民群体（最显著的是同性恋群体）；而且强迫思想保守，对社会大众强加俄罗斯东正教教义。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是顶尖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与政府联系十分紧密。他突然移民海外，表明专家群体也很容易受到俄罗斯政府保守势力的攻击，这些保守分子常常隶属检察和特务机关。一般来讲，普京的行为正在毁灭俄罗斯政府和社会的体制完整性，而且缩减了日后势必渴求的人才库。

俄罗斯严苛的政治控制是主要来自普京总统对于潜在危机的软弱和恐惧还是来自其他方面，目前尚不清楚。然而，俄罗斯近年来的发展很可能为其不远的将来带来了更多而非降低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全球金融业

世界仍未摆脱 2007 年-2009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新的经济困难初露端倪。因为它才刚过去没多久，还不能说是已经彻底的结束，现在说从此前的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还为时过早。

近年来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货币发行过量、流动资金过剩以及对银行的监管不力所引发的。遗憾的是，目前这些隐患依然存在。

世界正在步入一个缓慢的经济恢复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称其为三速—复苏期。新兴市场总体上比西方经济体的复苏状况好很多，但势头并不强劲。由于美联储推行了流动性政策，美国目前经济的状况大为改观。由此也引出了美国经济复苏之路的可持续性问题。与此同时，欧洲经济的增长也一直困难重重，欧盟和欧元区内出现了多重复苏和决策（一些国家正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沼，同时还伴随着几近灾难性的失业率）。

金融监管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更为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标准已经出炉。然而，新的监管机制，如《巴塞尔协议 III》和根据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极为复杂，需要参照成百上千页的技术说明。结果是，全球的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飙升，世界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也可能会大打折扣。金融业大范围的整合与重组已经拉开序幕。同时，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增长二者间的联系可能会更为紧密。这一变化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更高的运营成本和更大的监管压力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银行的作为。

由此，国内外各国及政府不禁要问，我们的财政部门要做些什么？什么样的监督和监管机制能实现经济迅速复苏和增长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基础建设改革迫在眉睫。世界需要全球性的强有力的监管和监督机构。商业和金融本就没有界限。尽管商业和金融机构已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但监管仍以国家，甚至极少数是以地区为单位在实施。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针对这一情况，建议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并改革其管理体制使其更具代表性。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因为美国的阻挠而困难重重。美国向来不会在自身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喜欢无视他国政府，随心所欲的通过国内立法从诸多方面干涉他国内政。

金融业的另一个重要事项是社会的平等和公平问题。金融包容性得到了全球，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各国的日益重视。比如，在印度，拥有手机的民众数量比拥有银行账户的民众数量多出 50%。新技术应该使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有益的银行服务。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危机很可能会使一些极度贫困的地区遭受重创，因而，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成为当务之急。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全球范围内的影子银行系统以及灰色/非正规经济的规模。虽然全球监管力度的加大会刺激影子银行系统的蓬勃发展，但金融包容性将有助于限制其规模的发展。金融稳定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评估显示，2011 年，全球影子银行系统的规模为 67 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 23 万亿，中国占 2.2 万亿。

能源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已经成为共识。突发性事件、异常的天气状况和灾难性事件可能发生。这些突发性事件的确切性质和规模目前尚不清楚，但类似美国飓风桑迪级别的风暴有可能更为频繁。

当今世界，发电途径主要有四种，分别是：水电、核点、热电（煤，石油，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如果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设想无误，除了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核电外，没有任何其它经济实用的方式能够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而且不会加剧全球变暖的趋势。

核电技术的推广应伴随着对核燃料的跨国掌控和追踪、扩散监控及安全制度一并进行。这就需要我们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并赋予其强有力的国际授权。

多个国家的能量方程正在同时发生变化。美国有望在短时间内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中国也正在大范围地推广核能发电。俄罗斯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整体上都未能跟上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在国内天然气开采费用日益高涨而此前的需求安全已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俄罗斯可能需要调整战略。

目前正在开发新的更为安全的核能发电技术。然而，这些技术的可行性和实现时间还是未知数。中国在下一代核能发电技术研发中扮演的角色也尚未可知，但就目前来看，应该是举足轻重的。

为改变碳发电的现状，则需设定统一的国际碳排放价格。迄今为止，该举措面临了来自各方的阻力。也许在经历过一些重大危机和突发性事件后，全球才会达成共识，迅速转移到限制碳排放量并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全球发电状况的方向上来。

同时，可能发生的灾难性景象也成为关注点。尤其是，伴随着全球冻土的融化，大量的甲烷水合物可能会排入大气，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将在短期内使人类蒙受灭顶之灾。

未来的危机

研讨组深入探讨了世界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危机。关于危机的构成和应对方案可能有着不同的理念，某些挑战显而易见而且会对所有主要国家构成威胁。

危机自身无可避免，下一次的危机也势必会出现。但是，人类和专家人员并没有预测危机何时来袭以及以何种方式来袭的良好记录。有几个方面需引起适当重视，提高警惕性的同时，还要为应对一个或多个问题的同时出现做好更为充分的准备。

(1) 下一次金融危机

下一次金融危机很可能会在其它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前爆发。事实上，上一次金融危机仍余波未平：经济复苏十分缓慢，讨论的所有国家的金融体系中都存在着问题方面。

2007年-2009年爆发的危机所引发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使得一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实际上，目前这些问题引发的争论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在面临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时，刺激或紧缩，哪种方式最为有效？在不影响金融机构和银行系统协同生产和运作的前提下，以何种方式执行银行监管最好？

当今的全球金融体系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剩的流动性条件下运作，资产价格泡沫几乎必定会不断增加，可能会为新的危机埋下隐患。

(2) 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造成的突发性事件可能会不断攀升，对全世界多个国家造成深远的影响。全球变暖的影响往往是政治性的。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贫穷的国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下全球变暖这一挑战所造成的影响。

由气候变化相关现象所引发的政治性突发事件愈来愈多。阿拉伯之春运动从某种程度上看，是由市场上不断攀升的食品价格尤其是面包价格所引起的，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一系列的庄稼歉收。叙利亚历经4年的严重旱灾，大部分民众都陷入了极度的贫穷和苦难中，内战一触即发。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巴基斯坦，水资源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政治压力持续的源头，若情况恶化，就会导致突发性的暴乱。

(3) 网络安全

各国社会应对大规模网络攻击的能力尚未经过测试。然而，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机构及政府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一些知名的机构，比如金融行业机构，每年都会经历数百万次攻击，而且针对一国的财政部门、能源部门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可能是具有潜在的灾难性的。

近来，中美关系紧张，加之此前俄罗斯被控攻击爱沙尼亚的事件（事实上，攻击可能并非来自俄罗斯），表明潜在的网络安全问题会造成重大的国际分歧甚至潜在的更大范围的冲突。

(4) 流行病

流行病和病毒的耐药菌株很可能会以新的频率出现，要做到有效应对，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将之尽快解决。

政策建议

北京研讨会的参与者，尤其关注从讨论中衍生出来的政策建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所有与会者中寻求共识很可能会没什么成效，多样化的观点和视角恰恰才是卡内基/FSVC 举办一系列项目的价值之所在。涉及到关键领域的政策建议如下：

金融领域：

- (1)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管理机制，并拓展其权利范围。
- (2) 改变世界银行的权利范围，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可行的新方向是：
 - a. 支持廉政建设/政务透明；
 - b. 促进可持续发展
 - c. 提供发展基金
 - d. 仅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并设置扶贫目标。

(3) 建立国际信息共享机制，并针对举足轻重的或规模不易监管的机构设置一整套标准。

法律：

(1) 简要列出复杂的国际监管问题，尤其是金融和核能等技术领域。通过广泛的宣传来促进最佳实践的认识和共享。

网络安全：

(1) 推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关于网络安全、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攻击的决议（以安理会第 1540 号决议为蓝本）。

- (2) 针对构成网络攻击和网络恐怖主义的行为制定国际公认的定义和阈值。
- (3) 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创建网络取证程序。
- (4) 制定关于网络安全的国际协议，包括承诺不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比如发电站、交通运输网络、医疗中心等等）。
- (5) 建立有关网络安全的咨询电话。

能源和气候变化：

- (1) 建立富国对穷国的协助和补偿机制，富国历来最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而穷国则可能受气候变化破坏最严重，而且也最难以应对灾难性事件的影响。
- (2) 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相关灾害的教育进行投资。
- (3) 为核燃料供应商和消费者（国家）间的贸易创建国际财团。
- (4) 为新型安全可靠的核技术开展国际资助的合作研究。
- (5) 更加积极地接纳中国进入核能机制中。

结论性意见

本次北京研讨会所进行的讨论是 FSVC 曾经举办过的会议中最发人深省的一次，本次讨论以新颖的启发式方式为复杂的政策问题提供了框架。许多“冉冉新星”的加入，使得意见交换变得活跃，他们从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所经历的巨变出发提出了宝贵的视角。

与会者详细讨论了如何分享观点，以便这些意见可以得到国家决策者的关注。FSVC 和与会者们都承诺认真对待观点传播问题。有些传播途径已经找到，部分途径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由 FSVC 和与会者共同建立。宣传方式包括在 FSVC 官方网站上发布研讨会和项目的专门拓展网页、华盛顿的圆桌政策会议、纽约研讨会与会者、社论以及与会者制定的政策文件。

国际金融体系、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已经跻身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复杂问题之列，这些问题需要国际层面的政策相互协调，而且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间的合作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除了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本次北京研讨会更重要的是为关键问题提供了框架，也为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和舆论导向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做出了贡献。

面对日益复杂的问题，来自四个国家的与会者都注意到了现有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层应对当下挑战的不足。尽管各国处理领导层缺失的形式不同，但是加强公共管理和公共部门决策显然是共同需要。

全世界目前迫切需要改变现行能源生产方式。也需要国家内部更好地实现收入平等或提高最低生活水平，这些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是不可或缺的。一国的金融体制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中产生的问题与其他问题联系紧密，必须予以解决以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北京研讨会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建设性且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部分原因就在于四国与会者之间超乎寻常的相互信任。